



E-mail:hdzk@ycwb.com

羊城晚报

人文周刊 · 广角

A5

2020年5月17日/星期日/副刊编辑部主编/责编 吴小攀/美编 夏学群/校对 温瀚

日前,历史作家吴钩推出传记作品《宋仁宗:共治时代》,详细讲述了宋仁宗的一生以及他面对的制度环境。无独有偶,近日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同样以宋仁宗为主角,其画面、打光、构图、调色、服装道具都非常精致,基本上还原了宋朝的风雅气韵。近些年来,以宋代历史为背景的历史影视剧渐多,无论是2018年底开播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还是即将收官的《清平乐》,都是从大众熟悉的宋代文学世界出发,展现更为宽广的宋代中国及其历史与美学。

故宫南薰殿旧藏宋仁宗坐像



《清平乐》宣传海报

吴钩: 宋代,那些被忽略掉的精彩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蔡梦婷 冯嘉兴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北宋第四位皇帝宋仁宗赵祯所缔造的“嘉祐之治”,为赵宋之世的高峰。从民间故事“狸猫换太子”的当事太子到缔造“仁宗盛治”的一国之君,宋仁宗的一生虽然平淡,但在他御宇期间,却涌现了众多杰出人才:“唐宋八大家”中有6位在仁宗朝登上历史舞台,学术界中的“宋初三先生”与“北宋五子”也活跃于仁宗时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3项出现在仁宗时代。

吴钩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近代以来,人们把对现实的焦虑感,投射到历史当中,宋王朝在军事上所表现出来的“积贫积弱”成为某种刻板印象。随着社会发展,宋代中国独特的审美趣味、雅致的生活方式、开明的社会氛围日益吸引国人,“宋代历史有很多我们以前忽略掉的精彩”。

值得书写的。

羊城晚报:书中比较集中突出地描述了宋仁宗性格中的“克制”,电视剧《清平乐》中所表现的跟您认识的或者说历史中真实的仁宗的相似程度有多少?

吴钩:我觉得电视剧里王凯扮演的仁宗皇帝,相对来说可能拔高了一点。比如我们看电视剧,仁宗皇帝是很英明神武的一个人,很多事情他其实都是知道的,比如他明白这些大臣、台谏官的花花心肠,只不过不想当众说破。还有一些事情是仁宗皇帝主动做出来的,比如他把后宫的尚美人送出宫,历史上的确有尚美人存在,也的确被送出宫了,但仁宗皇帝并非自愿,而是被迫无奈,因为当时的大臣们整天絮絮叨叨,要求皇帝把尚美人送走。因为这个尚美人很妖艳,仁宗皇帝对她很宠爱,还因沉迷美色生了一场大病,皇帝虽然舍不得,还是只能点头同意。

所以历史上真实的宋仁宗其实没有电视剧里面的那么高大,他更加庸常一点,性格相对来说也软弱一点。但我们绝对不能因此就说宋仁宗是一名昏君。他不昏庸的地方体现在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短处在哪里。他明白以自己这种比较平庸的资质,肯定治理不了国家。所以他认识到应该集思广益,充分地让大家表达意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知道作为一个皇帝应该克制自己的欲望,包括权力的欲望。

羊城晚报:您刚才提到“以仁宗时代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很多”,宋代何以成为重要IP来源?

吴钩:这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宋朝的这种名臣辈出有关系,他们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存在,每一个人走出来就是类似于现在的流量明星。所以拿他们来编故事的话就有吸引力,能够吸引人去看。但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文艺作品,包括写包青天等等,这些故事情节本身是虚构的,只不过拿了宋朝这些有名人物当主角而已。

羊城晚报:历史影视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过去有描绘清代的“辫子戏”,也有明史热。今天人们把眼光放在了宋代,是什么原因?

吴钩:我个人觉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我们之前看的历史剧,往往把焦点放在了官场的政治斗争,或是后宫的宫斗上。这的确可以吸引很多观众,但是宫斗戏看多了之后就会觉得乏味,观众的兴趣点就会发生转移。所以我觉得,像《清平乐》这种剧出来,大家就会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宋代的朝堂,可能跟之前看到的清宫戏有点不一样。我们会看到君王与士大夫真的是在

羊城晚报:您在什么时候开始对宋代历史感兴趣,从而开始宋代历史的写作?

吴钩:大概是10年前的事吧。这跟我个人的写作经历和阅读经历有关系。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读历史题材的书和武侠小说。同时也不是对宋朝感兴趣,只不过泛泛地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大概是十多年前,那个时候关注点是放在明清,看明清方面的史料主要是一些官场小说、文人笔记,等等。那时候看得有点郁闷,因为在里面会发现很多很黑暗的东西,会比较郁闷。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从明清往前再看看,之前的朝代会不会也是这样,就去找了一些跟宋代有关的书籍来看,看多了就发现,其实宋朝是最符合我个人价值观和审美的一朝代。所以慢慢地就把自己更多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解宋朝上。

羊城晚报:在了解、写作宋代历史的过程中,您吸取了哪些学界的研究所?

吴钩:我个人比较认同,比较自觉去引用的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来自于海外汉学家所提出的“唐宋变革论”,我个人比较认同这一说法,所以我的几本书其实隐隐约约都有变革论的这个理论在背后。

羊城晚报:“唐宋变革论”“宋代经济革命”等学术观点均认为宋代开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的一个新阶段。如何评价宋代君王、权臣的个人作为与历史时代背景的关系?

吴钩:我觉得这跟宋朝政府作为一个机构,它的理念、它的作为关系还是很大的,跟具体哪一个人关系可能不大。宋朝政府有一个特点:重视商业。其他王朝对商业可能有点轻视它、忽略它,就没那么在意,甚至可能有意压制它。但宋朝不轻视也不压制,它是鼓励,甚至政府本身就充当一个类似大商人的角色,参与到市场当中去,发展商业、开拓市场。这也是宋朝的经济非常繁荣的基础。这套做法我们是可以用“重商主义”来概括的,它最关键的一个含义就是国家或政府非常主动地介入到商业当中来,以推动商业的发展。重商主义对世界的近代化是非常重要的,几乎每个国家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化,都经过重商主义这么一个阶段。所以海外有一些汉学家认为,宋代中国是世界近代化的一个起点。

羊城晚报:过去会评价宋代特别是北宋时期国家“积贫积弱”,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吴钩:这得看我们从什么角度来看“积贫积弱”,我个人是不大赞同这个说法

的。如果跟汉唐最强盛的时候相比,宋朝的军事好像看起来的确有点弱,比如汉朝可以打败匈奴,唐朝最强大的时候也可以打败突厥。但是宋朝当时面对的都是北方的骑兵,比如西夏、辽国、金国,等等,它都没办法取胜,虽然在战场上也打过胜仗,但起码没办法像汉唐那样征服对方的骑兵,从这个角度来看,宋朝的确在军事上是比较弱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弱是有客观原因的。汉唐时候的北方,不管是突厥还是匈奴,它还处于一个部落联盟的阶段,而到了宋代,不管是辽国、金国还是西夏,它们都建立了国家,国家无论在财政能力还是军事动员能力上,相比起部落联盟都是大大增强的,也就是说宋朝面对的是这些北方部族政权最强盛的时代,而且宋朝所面对的北方政权不是一个,而是一连出了好几个,它们就类似车轮战一样跟宋王朝对抗,宋王朝的表现虽然没那么强悍,但韧性还是很大的,它在强敌轮流的情况下,还维持了三百多年,还成为汉朝之后寿命最长的一个王朝,这一点很不容易,也说明了它的军事链其实没有那么弱。

对于“积贫”我更加不同意,因为你不管从政府的财政收入来看,还是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看,宋代都是处于中国古代收入水平最高的一个王朝,这个是有学者的研究数据支撑的,只不过因为宋朝投入养兵的财政开支太大了,财政上有点支撑不过来,所以才会有“积贫”这个说法。

羊城晚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对于宋代的认识跟过去有什么显著的变化?

吴钩:以前,特别是近代以来,我们评价宋朝时,大多数人都把一种对现实的焦虑感,投射到历史当中去。因为近代的时候,中国的确是积贫积弱,所以宋朝积贫积弱这种军事上表现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就更加凸显出来,人们在评价历史时会更加强调这一点,从而反映内心的焦虑,这是近代看历史的特点。

那么到了现代,这种危险基本上不存在了,不但不存在,而且我们现在的经济水平也越来越高了,随之精神上的需求也更加凸现出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宋朝能够提供给我们精神需求方面的参考,包括雅致的生活、开明宽容的社会氛围,等等。这时我们会比较从容一点,就会发现在所谓“积贫积弱”这种刻板印象的背后,其实宋朝的历史还是精彩的,有很多我们以前忽略掉的东西。

书话

格非的一根鲨鱼骨头

□吴 尖

《月落荒寺》的叙事起点

刚进大学,就有写作课,格非和宋琳联合授课,但当时的校园氛围有些特别,一边夜深人静大家都在奋笔写诗写小说,一边在课堂上装顽主。我自己就是个“二流子”,坐在文史楼301教室最后一排,一边打油诗一边辨识河西食堂飘出的大排气息,课间休息,格非抽烟,就有男生围上去一起抽,抽烟群展现的轻松和愉悦大概让有些同学觉得这是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渐渐的,围上去抽烟的从内环发展到二三环。如此,一个学期的写作课下来,图书馆的卡夫卡借阅量多了几个,去后门买香烟的多了几十个。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大约就是格非最新小说《月落荒寺》的叙事起点。主人公林宜生南京完成学业,博士毕业后来到北京,在一所有理工科背景的大学里教“马原”。新世纪带来转机,林宜生走穴全国文化课,成了百万教授,但也被生活打了耳

光,妻子出轨,自己神经衰弱。小说接着兵分三路,地面路描述林宜生和他的知识分子中产朋友圈,高架路以梦一样出现梦一样消失的楚云为主线,辅路展开林宜生和儿子及前妻的因果。最后,小说以一场圆明园音乐会收拢人事,既幻灭又幻梦地把二十世纪末代知识分子送入月下荒寺。剧终。

面上,这部作品和格非之前的《隐身衣》有很多交叉,原来的副线人物在《月落荒寺》中成了主场人物,像剧中人,主唱和副唱交换了位置,或者,格非在《上海书评》采访中说的一个意思,林宜生们,从《隐身衣》到《月落荒寺》,突破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文本“常人”,突破了“隐身”的位置,开始对自己的存在发出既脆弱又锐利的思考。文本和人物的互相转场,是先锋一代最娴熟的技巧,马原这样干,余华也这样干,只是格非把这种手法发展成一种语法。

小说中的文人气

不过,我想强调的是这部作品本身。小说开头就写,四月初的一天下午,“林宜生和楚云从楼下上来了”,这句话如此眼熟。没错,它跟《江南三部曲》的第一句话几乎一模一样,《人面桃花》开头就是:“父亲从楼下上来了。”从2004年的《人面桃花》,到2019年的《月落荒寺》,十五年,格非终于从楼下上来了。

整本书,虽然依然受“月落荒寺”格式的束缚,里面有大量典雅的诗词歌赋,包括楚月本人神秘的氤氲之气,以及她让林宜生刮目相看的时刻,也是因为他发现她的知识面“并不限于日本俳句、白居易和帕斯卡尔”,她懂德彪西,还能对马丁·路德的音乐贡献下判断,这些,都是格非以往小说中的、以后还会有的一种文人气。但是,时代突入了他的小说。

卡尔·施密特在论述《哈姆雷特》时指出,悲剧和悲哀的戏剧不一样,后者其实只是表演剧,而悲剧是无法被表演的。“悲剧事件的核心、悲剧货真价实的根源是某种无法掩盖的东西”,是即便是莎士比亚这

样的天才也无法虚构的东西,也就是“时代性”。换言之,悲剧不是基于被共同承认的语言以及戏剧规则,而是基于共通的历史现实这一活生生的经验而成立”。

上述观点来自施密特的《哈姆雷特》或赫库芭:时代侵入戏剧,看《月落荒寺》的时候,不断想到施密特的这本书。这么说吧,在这部最新作品中,格非似乎终于放弃了他已然成熟且深受读者喜爱的演技,用这种演技,他已能胜任各种戏剧,他能神秘又轻松地驾驭一切幻想和情景,可以不动声色也可以声色翻滚,但是,新世纪开始,他应该就已经意识到,有些东西,永远无法虚构,就像现实的硬核是任何作家无力手创造。《哈姆雷特》最后是直接从眼前的现实中取材,终于让一个悲哀的戏剧上升为悲剧。

把悲哀的戏剧上升为悲剧,《江南三部曲》是一次思想实践,《月落荒寺》则是一次全方位的更彻底的实践,因为这一次,现实还侵入了格非的叙事和语言层面。

“格非写什么都是城市的”

莫言曾经开玩笑地说,无论他写什么,都是乡村小说,但无论格非写什么,都是城市的。这话非常精准,仔细体味,可以说其中也包含了一层批评。从八十年代写到今天,格非一直以“结构现代,文辞雅致”赢得读者,即使是在以乡村为背景的小说中,男男女女也基本没有丰乳肥臀的言辞,但是,《月落荒寺》中,格非的语言突然粗糙起来,风格的放弃是任何作家都不敢随便实施的,但格非似乎决心重建叙事和生活的关系。

如此,“月落荒寺”出场。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月落荒寺”这个意象高了点,尤其最后还要搞到圆明园正觉寺去,挥不去的上流社会广场舞感,好在主人公始終和这个上流社会保持了一种融人的间离。而格非做得最好的是,终场“月落”,并不是在圆明园完成。就像《哈姆雷特》最后一幕,作为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要为那个国家做好临终前的安排,“福丁布拉斯将被推戴为王,他已经得到我这临死之人的同意”,格非也为林宜生和楚月封印了创可贴,他们的生活都已恢复平静,各自成家,各自人生。我很喜欢这个结尾。它缓解了《春尽江南》结尾女主之死带来的遗憾,格非不过是完成了它的文学任务,而经由这最后的瞬间,格非下楼。

时代入侵小说。小说中出现的各种符号都失去了先锋滤镜,中关村,五道口,理工大学,雕刻时光,很多读者甚至把男主直接对位格非。格非落笔时刻,不会预料不到这个结果,对于一个特别擅长保护自己隐私的作家,这样的裸露几乎有点畅销小说的横竖横,格非可以把自己的音乐爱好者交给主人公,那主人公的失眠当然也可能就是格非自己的。而通过向文本上缴自己的部分生活,格非相当成功地在观众和文本之间建构了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读者、作者和小说主人公分享共同的生活。

写作课上的一个故事



这让我想起他当年在写作课上讲过的一个故事,似乎也是全班最投入的一次课,因为当时整个课堂安静下来。故事是这样的,一对恋人身出海,海誓山盟完毕,小伙掏出戒指,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浪头,戒指落海。恋人就这样被致命的浪头打散,各自天涯。很多年过去,他们相遇泰坦尼克晚宴,百感交集时刻,鲨鱼上桌,老女郎一口咬下去,牙齿咯噔。

戒指,她咬到了戒指!人人呼之欲出。格非好整以暇,几乎要拿出烟来抽。我们在想象中等他吐出烟圈,他说了一句:“她咬到一根鲨鱼骨头。”《月落荒寺》,格非下楼来,吐出他的鲨鱼骨头。在这个“具体的普遍性”里,我们穷尽一生寻求的答案,以既凄怆又温暖的形象,和我们觥筹交错。如此,无论是书中卢卡奇的“深渊大酒店”,还是薛特的“两种生活”,都被月亮统摄,因为它严厉地照竹林,也温柔地照沟渠。存在就是我们的全部职责,用弥尔顿的诗来说,只是站着待命的,也是伺候。